

編後語

這一期的關鍵詞是「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但其關鍵內容還是上一期的延續，即「憲政」。在中文世界中討論「國家建設」這個問題，總免不了要在這個詞語第一次出現時加上英文後註。之所以如此累贅，全在於「國家建設」這個中文詞，如果望文生義的話，同其英文中對應的那個詞，意思完全不一樣。我們這裏討論的「國家建設」，並不是如何建設一個特定的國家(country)，而是特指一個國家內部政府制度和組織的建設，也關注政府職能的設置以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毫無疑問，國家建設是國家發展重要決定因素之一。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選刊的三篇文章，均從憲政發展的角度討論中國的「國家建設」問題。陳子明闡發了一個憲政民主主義者心目中的「國家建設」觀，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維度是建設現代科層制和推進從統治到治理的轉型。蕭瀚討論了中國轉型所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如何在一個官僚社會中建設一個憲政國家。作為公民社會的對立面，官僚社會的特徵是以等級化方式組織起來的權力時常滲透在國人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之中。在這樣的社會中，對權力的迷信、崇拜和畏懼常常伴隨着對於限制權力的不屑。王正緒專論國家元首制度的建設。依照他的分析，中國的國家元首制度經歷了長達六十多年的演變，現在依然處在「準制度化」的階段，其中最為關鍵的環節在於執政黨與國家元首之間的憲政安排尚未完全制度化。

本期的「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刊載了高毅的長文，詳細分析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暴力型政治文化的起源及其影響。這篇宏文的寫作背景，是在中文世界中日益高漲的「告別革命」之聲。溫和的、緩慢的、一點一滴的改良或改革，被普遍視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唯一正確之路，而以往的種種革命，包括法國大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都被視為可怕的歷史錯誤，中國乃至整個人類社會都應在未來竭力阻止革命型歷史悲劇的重演。於是，對於人類歷史、現在與未來的任何事件，都有了一個新的道德評判標竿，即革命與否或革命型暴力的慘烈程度如何。高毅雄辯地論證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正當性，以及法國式革命暴力在推進中國革命和塑形中國現代政治文化中的歷史性作用。儘管「歷史正當性」這個概念是否具有正當性，依然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議題，但高文啟示我們，革命的爆發自有其滋生的條件和內在的機制，在很多情況下，革命能否告別並不是一個道德評判或願望問題。

我刊編委會迎來了四位新的編委，即台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王宏志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沈志華教授和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梁其姿教授。他們的到來，將有力地促動我刊的「改良」或靜悄悄、非暴烈的「革命」。